

句章港： 被遗忘的越窑青瓷始发港

古迹

戴光中

公元前473年，越王勾践灭吴，特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与乍山翻水站一带筑城，命名“句章”，以扬威纪念。这是宁波全域有史以来第一座城邑。而在城南余姚江滨，与此相伴出现了宁波史上最早的港口——句章古港。

关于句章港的研究很少，1989年出版的《宁波港史》为其单列一节“句章古港”。文章指出：“这是甬江流域出现最早的港口”，也是“越国的通海门户、中国最古老的海港之一”。同时又认为：“自建成后一直以军事目的为主”“句章古港的航海活动，仅仅局限于军事、政治及简单交换活动。所以，句章古港只能称为中国最早的军港之一。”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，就是“秦汉至六朝的800余年中，句章作为海上交通和军事行动的出入港口而屡见于史册”“对海上贸易却很少记录”。

但在笔者看来，“军港”之说值得商榷。史籍所载句章港的海上交通和军事行动，《宁波港史》列举如下：

三国时，为了征服百越和控制海上交通线，派王助和朱买臣等建立海上武装。闽越出兵进攻东瓯，武帝派王助从会稽发兵航海救东瓯。公元前111年秋，东越王余善叛汉朝。据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载，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率领军队，从会稽乘船出海，于次年冬攻入东越。这是见诸史籍最早的一次从会稽出海的大规模海上军事行动。

东汉顺帝阳嘉元年（132年），海贼曾旌等寇会稽，杀句章、鄞、鄞三县长，攻会稽东部都尉，“诏缘海县各屯兵戍”。句章实为会稽的海上门户。

三国时，吴据长江以南，句章是其重要港口之一，故派有水军驻守。吴皇帝永安七年（264年）四月，“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，略长吏（赏林）（资材）及男女二百余口。将军孙越缴得一船，获三十人”。

晋安帝隆安三年（399年）九月，琅琊人孙恩率部乘船自海道南下浙东沿海，入大浹口（镇海口），溯甬江而上，攻下句章。又经余姚、上虞，占领会稽城，自号征东将军。晋帝命刘牢之讨伐孙恩，参军都护刘钟自余姚进兵夹击句章。孙恩军受挫，率众20万撤往舟山群岛。孙恩撤军后，刘牢之命刘裕守句章。隆安四年（400年）二月，



句章古港发掘现场（资料图片）

孙恩率舟师自海道复入浹口，屡攻句章，均遭到刘裕军阻击。关内侯虞邱进随刘裕屯兵句章，城被围数十日。以后，刘牢之率大军来援，孙恩始退还海上。

这些史料表明，从秦汉至六朝的800余年中，句章港共发生了5次军事行动，但因此定性句章港为“军港”，无疑是不能让人信服的。另一方面，作为存在数百年的通海门户，如果仅有5次军事行动而没有交通运输等经济活动，同样是无法让人相信的。古代史籍之所以缺少这方面的记录，是因为正史学书对此从来不屑一顾。试看同时期的其他港口，可曾有过商贸运输的记载？然而事实上，恰恰是依靠不见于史籍记载却络绎不绝的水上运输业，才使句章港屹立余姚江畔800年，直至唐明州刺史韩察在三江口建城、明州港崛起，取而代之为新的通海门户。

孙恩之乱后，学者大都认为，句章港逐渐废圮了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2014年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《句章故城：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》出版。报告称，发现了一处东汉至东晋时期码头遗迹和一处唐宋时期卵石路面遗迹，并进行了碳14测试，最后得出结论：“东晋未叶，句章城池残破，县治迁往他处，但句章古港的功能并未因此而完全丧失，L1（即卵石路面）的发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直至唐宋时期，明州港城逐步崛起后，宁波港口的发展由单水道位正式进入交叉水道位的新的阶段，曾经喧闹一时的句章古港才最终步句章故城之后尘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”

从史籍所载几次军事行动可以看出，三国两晋时期，句章港至各地的海上航路已经开辟。西晋陆云曾用文学语言描述：“东临巨海，往往无涯，泛船长驱，一举千里，北接青、徐，南洞交、广”。而从句章港运输出海的最重要物资，正是浙东特产越窑青瓷。

越窑青瓷初创于东汉时期，当时已能烧制出成熟瓷器。三国两晋时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，产品种类特别是明器（也称冥器）非常丰富，在江浙一带的墓葬中有大量发

现。当时的越窑青瓷中心产地慈溪上林湖和上虞寺前，都与句章港相距不远且水路畅通。瓷器易碎、占地空间大，走水路是最佳运输方式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句章港附近大湾山的东坡和南坡，分别发现一处窑址。东坡的属于东汉时期，采集有当时常见的盘口壶等物。南坡的属于唐宋时期，周边散落有大量瓷片，主要是五代至北宋的青瓷碗底残片和少量青白瓷碗等。由此或可猜测，自东汉至北宋，句章附近亦存在越窑青瓷的窑场群落，同时也证明了句章港没有因县治迁移而废圮。

句章港作为越窑青瓷始发港，虽然在史籍中缺少相关记载，但各地的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越窑青瓷，足以证明早在两晋时期，越窑青瓷就通过甬江、沿着海岸线北上，经渤海湾输往朝鲜半岛西南部，从而开启了东亚的“海上陶瓷之路”。当地已发现了一些东晋至南朝时期的出土实物，如梦村城发现的越窑青瓷盘口壶残片和黑釉钱纹陶罐残片，首尔石村洞古墓群出土的青釉瓷，在造型、胎土和施釉技法上很接近典型的越窑风格。石村洞3号坟附近出土的一件青瓷四系罐，年代应为东晋中晚期，属于越窑器物。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出土的青瓷羊，年代大致为4世纪中期，风格与余姚文物部门所藏的东晋青瓷羊相近。此外，也有一些越窑青瓷北上至青、徐等地，再经江、淮、黄河运抵中原地区，供王公贵族使用。

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、干有成曾撰文指出，“越窑青瓷是宁波与东亚海上陶瓷之路的先行者、开拓者。越窑青瓷自晋代开始输往朝鲜半岛，六七世纪之交输往日本列岛，输往东亚的年代比任何窑口瓷器都要早。”但遗憾的是，此文通篇都写宁波明州港，只字未提句章港。显而易见，这与史实不符。须知明州港和明州城相伴建立，时在公元821年前后。此前，宁波的通海门户唯有句章港，所以这里才是越窑青瓷的始发港。

作为宁波最早的港口、中国最早的海港之一，句章港被误判乃至遗忘，委实太久了，是时候为其正名了。

金漆门记

道考古

高子华

金漆门，一个隐隐透出威严感的名字。这是一条海道的名字，这条海道位于浙江东南沿海三门湾出海口、象山半岛外南田岛的岛端小南山。古诗“金漆门开夜不关”，描述的就是这条从东海大洋出入三门湾的航道景象。

自古以来，在我国从北至南海岸线上，岛礁崱嵴形成的海道，恰似连接陆地和海洋的天然之门，故多以“门”相称，大者如天门、海门、江门等，小者如石浦渔港就有铜瓦门、东门、下湾门、蛸门（即临门）、三门罗列，一出五门便是东海。

金漆门在我心里，一直就像海岛的秘境世界，因为最早听到这个名字，就和魔幻般的故事连在一起。读初中时，有个高年级同学叫童晓荣，来自金漆门村，他在我家绘声绘色地讲“沉东京”的传说。遇到退潮时，村前靠海最远处，会露出一根根粗大的樟树干，扎根在海底，枝叶伸向天空，还会发现石码头路断断续续通向大海。划着小船“讨小海”，海水清澈时，还能隐隐约约看到海底的古船模样。

每次驱车穿洞过桥、斗折蛇行在南田岛壮美的沿海公路，车到岛的东头便是金漆门，视线所及，是浩渺无际的碧波东海，恍惚间会有到了天涯海角的独特感受。

但是金漆门给我最大的触动，是去年9月初的“寻碑之行”。我国著名海洋史学者谢湜在其著作《山海故人》中写到，在南田岛金漆门存留着一块“奉旨永远封禁”碑。虽然此前多次行访金漆门，却不知有这块封禁碑的存在。这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探寻的期待。

金漆门东南端的海岬小南山，犹如雄狮蹲踞大海，修建在海岬岩礁之上的简易码头，有一个篮球场大小，是金漆门渔民平时“讨小海”用的。去年，高温天气持续到了初秋，车停码头，打开车门的刹那，海岬口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，让人透不过气。

当我顶着骄阳爬上金漆门岛礁，果然看到，圣母官前矗立着的这块封禁碑，就像一方大印，盖在地边海角。石碑高约1米，宽约40厘米，厚约15厘米，朝向东南方的浩瀚东海。碑的正面镌刻如下朱漆大字：“奉旨永远封禁”，左面是“金漆门一带各岬”，右面是“道光三年口月三日立”。

有史以来，著名的封禁之地有二：

一是关外东北，清廷的“龙兴之地”；二是东南沿海舟山群岛、南田岛等岛屿。明清二朝，浙闽沿海诸岛和海域，是新旧王朝兵家最后的绞杀之地，由于新朝无力迅速在海岛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，在东南沿海普遍采取了迁弃封禁的防守策略。

清中叶，舟山群岛、玉环岛逐步开禁，但吊诡的是，与石浦只有短短“两潮”距离的南田岛，迟迟不被解禁。道光三年再次谕旨，南田岛继续封禁，同时将宁波海防同知从鄞县移住石浦，加强对南田的封禁管控。这块封禁碑，承载的就是这段沧桑往事。

不知勒石立碑者有意还是无意，将碑面“奉旨永远封禁”六个大字，直面三门湾，碑前抬眼，就可望见右前方花岙岛著名的大佛头山，传说中南明抗清英雄张煌言最后的藏身处。

“一部南明史，收局在煌言”。遥想当年，南明抗清将领张煌言、张名振依托东南沿海诸岛和海域，顽强抵抗清军长达十九年。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郑成功率率舰队从福建沿海北上，与张煌言义军会师于金漆门外的东海洋面。郑张大军陷舟山，破镇江，下芜湖，兵围南京，震动江南。

千百年来，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金戈铁马的陆地征战史，不意却以一次大规模的海上北伐来结尾。这次南明势力的最后一搏，以兵围南京功亏一篑告终。张煌言撤回大本营南田岛后以诗明志：“有幸此身仍健在，拟随斗柄独回天”，直至被俘。

对于这段血雨腥风的往事，有清一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有论断：“张忠烈（张煌言）收局于斯（南田岛）”。就是说，张煌言在南田被俘，不仅意味着南明抵抗运动的终结，也为明代历史上上了句号。

直到清末大势已去，“龙兴之地”东北解禁十五年后，南田岛才被解禁，这已是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离清廷垮台不远了。从明初以“孤悬大海”被封禁，历经明清王朝鼎革，南田岛被封禁近五百年。元末明初诗人顾田的《怀临门故乡》“桑田尽变鱼虾池，火宅浑为麋鹿场”，道尽当年先民家园被毁、背井离乡的凄楚。

站在金漆门“奉旨永远封禁”碑前，天风浩荡，海浪滔滔。就在正前方的三门湾南岸，巍然壮观的三门湾核电站已经拔地而起。历史与现实，就以这种奇妙的世界，在这个我们已知和未知的海岛方式，交叠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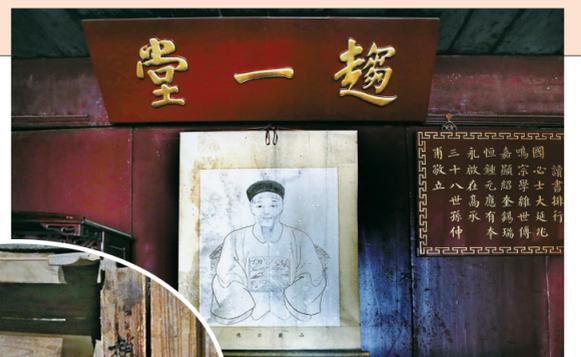


▲余姚市马渚镇杨岐岙杨氏家祠的“四知堂”。

▲慈溪市观海卫镇团前方村的“五桂堂祠”大门。



▲“八行堂”在史家祠堂内的正厅。



▲慈溪市观海卫镇蒋家桥村蒋家西路的“趋一堂”。

▲标有“趋琴鹤堂置”的扇谷风车。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过去，常出现堂号的地方是祠堂、中药房和印书坊。如中药房有北京的同仁堂、杭州的胡庆余堂、宁波的香山堂等；印书坊有杭州的平山堂、文会堂和宁波的三徐堂等。而祠堂的堂号，使用最普遍，变动也最少，与家家户户相连，一对上“堂号”，就是自家人了。本文说的就是祠堂的堂号。

某年，我到东钱湖下水西村的史浩故里考察。从史家祠堂出来时，碰上了几位闲坐的老人。“‘八行堂’的‘八行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是我们上代太公的名字。”“上代太公的名字为什么叫‘八行’？他是排行老八吗？”“名字就是名字，没有什么可问的。”

追根问底的结局往往就是这样，好在东钱湖（四明）史氏是望族，要溯源并不难。四明史氏第四代史诏，身体力行宋徽宗提出的“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、中、和”等“八行”，获得宋帝诏书，被封为“八行先生”，赐“八行高士”称号。以后“八行”就作了堂号。

余姚市马渚镇杨岐岙村有杨氏宗祠，上悬“四知堂”匾，“四知”是杨姓堂号。据载，东汉名士杨震调任东莱太守时，路过昌邑。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举荐的官员，得知杨震到来，晚上携金

悄悄拜访。杨震当场拒绝了。王密便道：“暮夜无知者。”杨震说：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，何谓无知？”王密自感有愧，只得携金而回。此后“四知”成为千古美谈，杨姓以此为堂号。

我在余姚市博物馆拍过一台标有“赵琴鹤堂置”的扇谷风车，这“琴鹤堂”是赵氏的堂号，过去，堂号常常写在宗族共用的风车、水车上。宋代殿中侍御史赵忬（即清献公）人称“铁面御史”，常常弹劾自乐，还养了一只鹤，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清正，以鹤头的红顶暗示自己赤心。其后人遂以“琴鹤”为堂名，以纪念。

同样，宓氏有个“鸣琴堂”。童银舫在《慈溪家谱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宓氏是个稀见的姓氏，一般的人名辞典上查不到宓姓的名人。而在慈溪，却有一个大村，村民基本姓宓，并且在北地区相当出名——宓家埭……我在‘中华宓氏网’上查到一点有限的信息，谨转录如下：……1、郡望……2、堂号。鸣琴堂：春秋的时候，孔子的弟子宓不齐为单父宰。不齐是个很仁爱的人，而且很有才智，他每天只弹琴作乐，看起来不像他的同学巫子期治单父表

现的那么勤劳。但是单父仍然被他治理得很好，人们夸奖他是‘鸣琴而治’。”

看来，古人为使自家的堂号不落俗套，是费过很多心思的。

带“桂”字的堂号有不少，如“两桂堂”“双桂堂”“六桂堂”等。这个“桂”是“折桂”的意思，即高中进士。“两桂堂”“双桂堂”意味着父子或兄弟一起高中，“六桂堂”则表明兄弟六人共登科。“六桂堂”在全国有名。据载，五代后晋高祖天福年间（936年），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有个叫翁乾度的人，其六子先后中了进士，被誉为“满朝翁六桂联芳”。翁氏六兄弟在当时的闽国王朝中为官，闽国灭亡时为避祸，六兄弟分别改为洪、江、翁、方、龚、汪六个姓氏。

莆田历史上还出过“方氏六桂”和“龚氏六桂”。其中，关于“方氏六桂”的记载比较详细：歙人方廷范，唐昭宗大顺二年（891年）登进士，先后任浙江和福建的县令，受赠金紫光禄大夫。方廷范生有六子，皆出任闽国：长子仁远，官检校水部员外郎；次子仁岳，官秘书少监；三子仁瑞，官著作郎；四子仁逊，官大理司

直；五子仁载，官礼部郎中；六子仁远，官秘书省正字。世称“金紫六桂方氏”。

这里的方氏、龚氏与上述翁氏六兄弟改姓后的“方”“龚”不知是否有关系。

几年前，我到过观海卫镇团前方村，在那里见到了新修复的“五桂堂”。慈溪市内散落有多个方氏村落，所谓“三北十方”，方家河头古村、团前方村都是其中的“一方”。令我费解的是，这一带的方氏多称“六桂堂”，而团前方的方氏却偏偏称自己是“五桂堂”。就此我请教了观海卫镇地方文化研究者莫非先生。莫非先生答复：方廷范之五子仁载公，排五桂，行廿八；方廷范之六子仁远，排六桂，行廿九。因团前方的方氏认仁载公为自己的始祖，故堂号为“五桂堂”。

观海卫镇的西南郊有“卫前蒋家”，现称蒋家桥村，那里集居蒋姓，村上有蒋氏祠堂“继述堂”。在去“继述堂”的路上，我见到一排旧式民居有九间两层，正中一间屋檐下挂有“两叶清芬”门匾。进入正门，只见堂上挂着“趋一堂”堂匾，堂匾下有“品兰公像”。

我又寻到石碑一块，上刻碑文《九间

头记》：“九间头始建于大昂公，公字小园，乾隆三年至五十九年。我蒋氏族谱载，仁慈天授、孝友性成，克勤克俭家道俾昌，课耕课读门风丕振。凿地建屋五间，中间正堂额曰‘趋一堂’。生廷谱廷谐公，立二房。东房人丁式微；西屋廷谐公传兆椿公，继传于鸣芳公，字沛元，又名品兰，治学有成，望重慈北，旋蒙钦旌‘两叶清芬’匾悬挂堂上。鸣芳太婆相夫教子，纺纺织布，勤劳持家，得以增一间于西首乃成六间。百年前大成行在东旁又建三间，与原房合为九间，遂称‘九间头’。自大昂公创建至今，传九代历二百多年，孙等俾甫、伟甫、仲甫严守祖业，略加修理，刻石记之。”（此《记》是新碑，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）

有必要说明的是，不少大族往往上有总祠堂（大祠堂），下有分祠堂（支祠堂或小祠堂），各家各户又有自己的堂前（中堂）。分祠堂的堂号可袭自总祠堂的，也可另取，但各家的堂前多无堂号。“趋一堂”属本村蒋氏，在“继述堂”门下，是“九间头”私宅的堂前，它却拥有自己的堂号，这是值得探究的。

阅读碑文可知，“九间头”分三期而建，第一期建成后，中间正堂已取名“趋一堂”，估计是在清代。然而，碑文没有写明“趋一”的出典。

“趋一”的含义是什么？至今未找到答案。但对堂号的追根问底，让我由此了解了“趋一堂”几代人为观海卫兴办教育所作的贡献。

追根问底话堂号